学人关注

·编者按·

在国家积极构建老年宜居环境的政策实践中，性别差异长期被忽视，养老设施难以满足女性老年人需求。本文在分析女性老年人生理机能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合女性老年人需求的适老化设计和改造建议，更加契合以人为本的养老理念。本文作者认为，女性老年人适老化设计和改造的关键在于正视女性老年人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女性老年人生活质量。

重视养老环境规划与设施改造的性别差异

■ 丁立伟

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末，全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全国人口的14.2%。按照联合国的新标准，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社会。积极应对老龄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和适老化设计，构建老年宜居环境已成为国家解决人口老龄问题的战略性要求。然而，在居家和社区适老化设计和改造的过程中，大量的普适化标准难以满足女性老年人的需求，性别差异长期被忽视，导致了新的养老不适。

女性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异于男性的表征

老龄化的主要特征是老年人生理机能的衰老，相比男性，进入老年阶段的女性，在生理机能上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首先，女性老年人近距离视觉能力下降高于男性。*进入老龄阶段，男女性老年人的感官功能都会明显退化，但是女性老年人视力功能衰退得更加明显。刘成军等学者的研究显示，老年人“低视力”和“盲”的患病率分别为3.54%、1.42%。而金文勇的数据表明，女性老年人的视觉患病率（34%）高于男性老年人（29.04%）。一般女性大约40岁开始出现视力模糊和近距离对焦困难，如不通过适老化设计和改造增加无障碍设施，可能会导致感知障碍，增加跌倒风险。

*其次，女性老年人骨骼和肌肉的萎缩高于男性。*钟振亚结合《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的研究认为，老年人从60岁开始，骨骼和肌肉出现明显的萎缩。一般老年人身高缩减约2.3%—3.5%。而女性老年人身高萎缩率更高，最大可达6%左右。女性的身高萎缩现象可能直接影响坐、立、行、卧和举等行为尺度，一些通用服务设施如不考虑适老化设计将无法正常使用。

*最后，女性老年人慢性疾病发病率高于男性。*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达75.0%。患病率前三位的是高血压（37.97%）、糖尿病（9.75%）和脑血管病（4.76%）。综合看，老年人的慢性病发病率，女性（35%）高于男性（31%）。

女性老年群体适老化设计和改造面临的困境

随着高龄女性老年人比例增大，重视性别差异，有利于准确把握女性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提高适老化设计和改造的精准度。

*第一，标准化的适老化设计与改造忽视了性别差异。*长期以来由于受现代设计思潮和普适思想影响，居家和社区的设计者通常弱化性别差异，沿用“无性别”或“男性化”标准的适老化设计，给女性老年人生活带来诸多尴尬和不便。

*第二，针对女性老年人的适老化设计水平较低。*数据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老年人的寿命长5岁左右。这种状况导致高龄失独、孤寡和失能的女性老年人数量增多。不仅如此，女性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经济依附性强，慢性疾病率高于男性。而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女性老年人的适老化规划、社区配套设施设计和改造的相关规范和政策，这给女性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者，带来诸多不便。

*第三，适老化设计与改造缺乏对女性老年人生理机能的考虑。*女性生理条件先天弱于男性，女性老年人情感细腻、情绪波动大、缺乏安全感，极易出现焦虑、孤独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基于其特殊性，打破适老化设计的无性化和中性化的性别盲点，有利于提高女性老年人的养老水平。

女性老年群体适老化设计和改造的路径选择

在多元化背景下，人们不应忽视适老化设计中的性别差异，应着重考虑女性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建立更加细微、更加人性化的适老化设计。

*第一，加快建立针对女性老年群体的专属适老化设计。*例如，对于一般女性老年人身高萎缩的现象，可以降低家具高度，避免因家具误差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尤其是一些对女性老年人影响比较大的普适养老设施，如吊柜把手、照明开关、热水器控制面板等，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对于空巢、失能和独居等特殊女老人可配备带有护理功能的女性专属设施。例如，可为空巢女性老年人配备带有检测功能的智能马桶，随时监测健康状况；为独居女性老年人配备防摔生命探测仪，预防摔倒，及时施救；为失能女性老年人配备智能护理床，便于老人翻身、下床和护理。当然，针对高龄及丧偶的女性老年群体，还需提供专门的健康护理服务和精神慰藉，以满足女性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第二，鼓励女性老年人参与社会，提高适老化设计和改造的满意度。*进入老龄阶段的女性大多有充裕的时间选择居家做家务、看电视或与邻家相互串门聊天。但是社会活动范围较小，休闲娱乐活动方式单调。WTO把“积极参与社会”作为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体现社会价值的重要内容。研究证明，老年人对其参与程度高的服务项目，满意度普遍较高。因此应该鼓励女性老年人以积极的心态参与社会，提高对适老化设计和改造的满意度，增加生命意义感。社会也应该消除性别偏见，采取包容和开放的态度，为女性老年人创造适宜的参与机会和环境，让女性老年人真正在参与中享受到国家为老年人提供的适老化服务。

*第三，完善提升女性老年人适老化环境的政策机制。*一方面，要从制度上和社会层面营造尊重女性、重视女性老年人的社会氛围，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让女性老年人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和照顾；另一方面，还应为女性老年人提供参与社会的平等机会，并建立参与监督机制。鼓励女性老年人参与有偿社会活动，增加老年女性的收入，缩短与男性老年人的收入差距，享受社会养老带来的红利。

以女性生理机能特征为切入口的适老化研究，有助于推动老年群体适老化设计和改造走向精细化。关注针对女性老年群体的适老化设计，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养老理念；女性老年人适老化设计和改造的关键在于突破以家庭为中心的养老空间，正视女性老年人的需求，并不意味着忽视男性老年人的需求。无论是以女性老年人还是以男性老年人为视角的研究，适老化都应该基于老年人的生理退化进行设计与改造，使其更加契合老年人的使用需求。虽然国内的适老化设计与改造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覆盖率也呈上升趋势，但我们应该看到：想要达到养老服务设施的真正适老化，就必须从多个角度提供养老精细化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养老质量，建立可持续的生态养老体系。

（作者为山东女子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新锐T台·青年学者扶助计划

阅读提示

居家隔离期间，男性通常会更多地参与到家务劳动中，当繁重而琐屑的家务得到共担，家庭成员间的亲密性增强，也动摇了传统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秩序。但男性从事家务劳动的实践以隐秘因而难以察觉的方式，保留了传统观念，在导向男女合作的同时又维持着两性的分离。本文作者认为，性别主体是能动且差异化的，通过彼此地位平等、角色开放而态度友好的合作与协商，男女两性可以达致公平、自由、更具创造性的美好愿景。

『做什么』与『怎么样』：疫情下男性家务劳动参与

■ 刘洁

伴随疫情防控常态化，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在进行着细微而深刻的调整，工作、消费、社交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家庭互动的调适尤其表现为男性对家务劳动的更多承担。

疫情之下“近庖厨”的男性

传统性别文化主张男性“远庖厨”，认为家务活是服务性的工作，不具有高公共价值，而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密集和廉价正是维系男性至上主义的策略。疫情期间，不少人因封控而居家，在家务劳作这一典型的女性空间，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男性参与现象。男性承担家务活具有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的进步性，而其中的微妙之处则显示出这一进步的有限性。

家务劳动女性化意味着女性在持家方面被期待有更多的投入却遭遇到不公平的贬值，受父权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排斥，女性的居家劳动巩固且再生产着她们的从属地位。对女性气质的赋意强化了女性的照料角色，即使对时间紧张、工作繁忙的职业女性而言，也不得不奔忙在家庭、孩子和家务三个领域。

居家隔离时，住宅不仅是家庭成员的休憩场所，也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了更大的分量，较之以往，男性通常会更多地参与到家务劳作中，他们频繁地涉足购物、做饭、打扫、洗衣、照料等私领域活动，养家人也承担起持家人的职责，女性则对这一现象普遍感到开心与知足。当繁重而琐屑的家务得到共担，家庭成员间的亲密性增强，家庭氛围也更加融洽与和谐。男性的参与减轻了女性的家务负担，相应也使她们平日的付出更加可见与可感，这有助于对女性承担家务活之现实的认可和尊重，也推动着夫妻关系的平等及协作，从而动摇了传统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秩序。

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特点与性别刻板印象的延伸

然而在家务共担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到男性所承担的劳作通常符合对男性形象的传统期待，虽然男性做家务这一事实挑战了性别脚本中有关男性“做什么”的规范，但他们的实践往往并无悖于有关男性“怎么样”的预设。

疫情期间，男性在参与家务活动时常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男性所做的家务活在常识中被认为更重要或者说地位更高，比如做饭时的掌勺相较于每日的洗涮；第二，男性不愿过多参与重复性的家务劳作，因此“擦抹”一类工作仍然多由女性负责；第三，男性做家务时往往追求速度而显得粗枝大叶，例如他们打扫卫生时“呼啦”就结束了；第四，男性对待家务活的态度多是无奈与不屑，他们常在女性“开口”督促或恳请后才为之，认为做家务是“替你”而不是“我该”。

通过男性的更多参与，平素被女性化的家务劳动安排向定型化、排他性的性别体系发起质疑，引发了力图突破既有藩篱的“性别麻烦”。但这一实践并未完成对父权式性别脚本的超越，女性于家务调整方面所获得的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种“底层权力”，即她们只能依托自己的性别去要求男性，这决定了男性分担家务时那有限、被动乃至“赏赐”的态度与行动。

在家务参与方面，女性的无名与污名相伴相随，对女性牺牲的视而不见因她们被强加的“他者”身份而得到了正当化，男性气质的工具性和女性气质的表达性体现出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的意义。但事态的复杂之处在于：男性从事家务劳动的实践以隐秘因而难以察觉的方式，在调整性别秩序的同时却保留了传统观念，在导向男女合作的同时又维持着两性的分离。

男性参与家务活的进步性和有限性贴合于共谋型男性气质的界定，他们即使不再完全奉守传统的性别意识，也多少会由于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自觉或不自觉地行使特权，也就是说，男性在卷入女性化的家务劳动时依然通过态度的不屑、行为的粗糙和内容的限定等享受着男性至上的性别红利。女性的获得往往离不开男性的施予，并且父权制遗留还规定了女性对这种“恩赐”的感激态度，所以我们看到女性对于疫情期男性的家务参与总抱持有满意和赞赏的心态。这一张力仿若“凑近看只不过是一根根不会伤害鸟儿的金属丝”，但事实上是对笼中鸟的“系统化相互关联的屏障”，“完美”安排的背后是性别迷思/偏见的荒谬与不公。男性参与家务活之所以成为受到关注的现象，与两性气质的分门别类和公私领域的严格区分对于性别秩序的建构及再生产有关。

经由合作、协商达致公平、自由

无可否认男性承担较往日更多的家务劳作，显示出性别观念和行为在认知生成、角色扮演、社会赞同等方面的可塑性，这带来了两性更大的可能与自由，既使女性的家庭价值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承认，也有助于男性对两性关系进行更多的探索和构筑。

如此，通过性别机制的重构（即使尚不完全），封闭的性别界限被模糊化，男性得到鼓励去拥抱进步男性运动所提倡的新男人形象，去尝试丰富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赋能路径，以型构更加健康与开放的社会肌体。

女性从事家务劳作的普遍以及对家务劳动的贬低是传统性别规范、市场资源定价和公私领域分离等因素所共同作用的结果，男性参与家务活的行动则对习焉不察的性别主义提出了挑战。无论公领域抑或私领域，两性在生活世界应剥除性别刻板印象的束缚，增强对于性别歧视的自反性。这并不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而有赖于更积极的性别意识与更广泛的平权实践。其实，每种性别身份都是“一个本不存在原件的副本”，性别具有流动性与多样态，性别主体是能动且差异化的，通过彼此地位平等、角色开放而态度友好的合作与协商，男女两性在包括家务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达致公平、自由、更具创造性的美好愿景。

（作者单位：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研究视窗

《个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家庭养老支持分工》

作者：陶涛 刘雯莉 李婷

家庭养老是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的具体体现。在多子女家庭内部，同胞之间的养老责任分工是在外部环境制约下，家庭内部个体之间出于不同的身份认同、利益需求和情感关系进行协商的结果。本研究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讨论了多子女家庭中子女养老支持的性别和排行分工，以此展现当前我国家庭多元复杂的代际关系模式。研究表明，不同结构类型的家庭内部养老分工的模式不同。在子女数量较少或性别一致时，子女之间责任均摊；在子女数量较多且性别不一致时，老大、女儿会给予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老小、儿子会给予父母更多的家务支持。多子女家庭中个体间利益、情感、责任的冲突碰撞表现得更为复杂，呈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的代际关系伦理与代际团结模式。

来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5期

《过渡的家：泰北华商合与分的家庭策略与家族企业经营》

作者：马潇骁

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巨大经济成就引来了世界的目光，其中家族企业如何成功接班传承成为学者们特别关注的话题。分家是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的关键，对于经营中小规模家族企业的海外华商家庭来说，分家既是其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家族企业经营和发展的重要策略。然而，针对华商家族企业的分家实践策略，特别是如何通过分家的具体实践使家庭生活与家族企业的经营、转型和传承相互适应的微观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以泰北中产华商的中小型家族企业的分家为例，试图探讨在个体、家庭、企业、社会等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中产华商家庭如何在分家的实践策略中，通过分与合的实践策略，形成多元的过渡家庭形态，实现理想家庭与现实生活中个人选择、家庭关系和商业经营的平衡。

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宋朝女性的离婚和再嫁自主权》

作者：萧盈盈

近几年出现了不少重新评价宋朝文化的畅销书籍，较常见的观点是认为有宋代，商业高速发展，经济空前繁荣，市民社会出现，人本思想初现端倪，女性的社会地位较前朝有所提高，离婚和再嫁者众多，因而婚姻自主权也较前朝提高很多。本文提出，且不论宋朝女性的社会地位可否以其婚姻状态为衡量标准，就能否以离婚和再嫁的数量推断女性在婚姻中自主权增大这一点，也颇值得商榷。

来源：《读书》2022年第4期

（刘天红 整理）